AI时代守住“人诗互证”的生命质感

□ 李少君

大语言模型可以瞬间生成格律严谨的七律、意象纷呈的自由诗，AI写诗词也早已不再是新鲜事，那么，诗歌还剩下什么？人类写作的意义究竟何在？有人惊慌失措，有人不屑一顾，有人盲目迷信和拥抱技术。其实，历史地看，每一次媒介变革都会带来类似的焦虑，但文学从未因此消亡。“文学死了”“诗歌死了”的聒噪，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阵，但文学之树依然常青。AI时代也是如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诗歌不必畏惧AI的挑战，真正需要坚守的，是“人诗互证”的活人感，是“大文学观”视野下汉语诗性传统的整体力量。

打破窄化的文学观，走向“大文学观”

建立诗歌面对AI的底气，首先需要跳出长久以来窄化、封闭的“纯文学”思维。现代学科专业分工，把文学切割得越来越细，通过不断排除的方式，划定出一套所谓“纯文学”的标准，仿佛只有特定形式、特定题材、特定审美趣味的文字，才有资格被称作文学。新时代文学重新倡导“大文学观”，正是对这种割裂的自觉纠偏。“大文学观”打破文体壁垒、跨越时代界限、融通雅俗边界，将一切拥有审美价值与人文精神的语言艺术纳入观照范围。这一理念根植于中国古代文史哲兼容的文学特质。屈原的《离骚》是诗，亦是政治抒情与哲学追问；司马迁的《史记》是史书，也是散文巅峰；苏轼的赤壁诸篇，融文章、诗歌、哲思于一体。文史哲合一，本就是中国文学的天然基因。

“大文学观”包含三个维度的融合：一是融合文史哲的学科视野，文学不只关乎技巧，更承载着一种文明对天地人关系的理解，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二是融合古今中西的时空维度，在时间上贯通古今，在空间上拥有世界乃至宇宙的视野；三是融合传统与当代的精神关切，大众从被代言的对象，变成自我言说的主体，天赋诗权，每个人都有表达自我的权利，网络文学、旧体诗词创作都被纳入文学整体的版图。

苏东坡就是“大文学观”的自觉实践者。他从不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种体裁、题材之中。他在《自评文》中写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这正是对“大文学观”最生动的古代注脚。文学的本质是内心抒发、情感表达与思想言说，形式与体裁，应当随物赋形。

苏东坡写诗、填词、作文、作赋、题跋、写书信，乃至画上的题诗，无一不是文学。他打通诗词文的界限，打破雅俗的壁垒，摒弃“为文而文”的矫饰。后世之所以不断追慕苏东坡，不单单是惊叹于他的才华，更是感佩他身上那种不设边界的文学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大文学观”的精髓。在AI可以轻易模仿各种文体的今天，苏东坡“随物赋形”的创作观提醒我们：形式从来不是文学的核心，内在于文字之中的生命体验、精神境界，才是不可替代的根本。

诗歌是生命在场的证词

2026年，大语言模型已经可以批量产出质量可观的诗歌，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AI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模仿任何一位诗人的风格生成文本。面对这一局面，有人恐慌，有人不屑，有人全盘拥抱。但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AI本质上是一种技术主义，是词语组合和修辞游戏。

把当下的文学处境放回中国诗歌史长河来审视，AI文学的兴起，本质是数据时代的集体智慧。这让人联想到《诗经》时代口耳相传、无具体署名的集体创作阶段。但二者之间存在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AI永远面向过去，而人的文学面向未知与未来。以我多次到访深圳为例，动身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此写下新作，也许被某处风景触动便落笔，也许终日奔波一字无成。人类的创作由现场、记忆偶然触发，充满不确定性。AI却不一样，只要输入海量关于深圳的旧文本，瞬间就能拼凑出一篇像模像样的诗作。

当然，我们不必彻底否定AI的工具价值。竹简、造纸、印刷、报刊，每一次媒介革新都曾引发“文学消亡”的叹息，AI不过是对人类既有智慧的一次大规模整理。借助AI实时翻译，歌德畅想的“世界文学”正逐步成为现实。但工具终究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感受。一片落叶飘落，一阵突如其来的秋雨，算法不会产生半分怅惘，而人看见此景，会生出感慨、思念与诗句。这份发自血肉之躯的触动，是机器永远无法模拟的。

抵御技术异化最核心的精神支点，我认为就是“人诗互证”。真正的诗歌，作品与作者的生命彼此印证。读懂一首诗，要读懂诗人的境遇；读懂一个人的人生，才能读懂文字背后的情感重量。小说常常书写他人的故事，依靠叙事技艺，而诗歌主体性极强，书写的是自我的生命，诗与人是一体。

李白的《赠汪伦》语言朴素如白话，但放在他“赐金放还”、仕途失意的人生处境中，方能读懂其中分量。彼时李白流落皖南，旁人多对其避之不及，汪伦以“万家酒楼、十里桃花”相邀，这份不带功利的善待，才孕育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古绝唱。诗歌不是悬空的修辞，而是生命现场凝结的文字。

诗歌境界的高低，同样离不开生命的淬炼。苏东坡早年写“欲把西湖比西子”，才情可观，但不少文人都能抵达这一层次。直到密州思弟写下《水调歌头》，尤其是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之后，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再一路贬至惠州、儋州，在绝境之中悟得“此心安处是吾乡”，才成为融儒释道于一身的集大成者。杜甫经历安史之乱，把个人命运与苍生苦难相连，方成就“诗圣”与“诗史”。磨难拓宽人的精神疆域，最终映照于笔端。

在当代文学现场，外卖诗人王计兵是“人诗互证”极具代表性的样本。为补贴家用，他穿梭城市街巷送外卖，目睹无数人间悲欢。一次因顾客报错地址无辜受责，满心委屈写下《赶时间的人》，引发千万级阅读。成就这首诗的，不是“外卖员”这个标签，而是真实生活浸润字里行间。反观一些写作者，堆砌意象与概念，看不到任何生命经验的痕迹。人类写作的意义，未必人人都要写出传世经典，对普通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书写属于自己的个人史。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到访深圳华强北，与一帮友人吃潮汕粥，最近时隔多年重临旧地，老友或远赴海外，或已然离世，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心绪，身处现场被唤醒，由此即兴催生诗作，写出“怀旧何如寻美食，两三好友步行游，华强北已新时代，潮汕粥香街里头”，还有“深南大道一场梦，唤醒青春豪迈情，多少英姿征热土，万千激励壮平生”，诗里全是我个人满满的情感、记忆和怀念。这正是人类写作区别于AI写作的关键。AI可以搜集所有关于深圳的旧文本，却无法拥有踏足此地之后，被记忆触发的独属于个体的复杂心绪。

自古写作最朴素的道理，便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肉身会消逝，但文字可以封存情感与经验。黄鹤楼屡遭焚毁，只要诗篇流传，黄鹤楼便活在文学之中；盛唐长安早已物是人非，只要唐诗还在，千年前的长安依旧鲜活。普通人写下的细碎个人史，同样拥有时代重量，无数个体的记录汇集，便是一个时代的文明切片。

AI时代，技术会不断迭代，可以模仿格律，模仿意象，模仿任何一位诗人的文风，但AI模仿不了“国破山河在”的沉痛，模仿不了“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情，模仿不了“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的生命力。诗歌不必畏惧AI的挑战。当我们以“大文学观”打通文史哲，贯通古今中西，促成新旧体诗的握手言和，我们就拥有了比AI更深厚、更完整的文学资源，这是算法无法复制的。

AI可以完成词语拼接、修辞游戏，可以汇总人类数千年的集体智慧，但它没有真实的悲欢，没有被现实场景击中的瞬间。AI时代，不是要弱化人的主体性，而是要强化主体性。守住“人诗互证”的生命质感，好好书写属于自己的个人史，以真实的生命灌注文字，便是诗歌面对AI时代最好的姿态。诗歌从来不是词语的游戏，它是生命在场的证词。只要人还在感受、在思考、在爱、在痛苦，诗歌就不会消亡。

（作者系《诗刊》主编）

文艺评论

因时而变，随事而制

□ 尹 磊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引用古训指出：“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这句古训出自西汉《盐铁论》，意思是明智之人能够顺应时代变迁调整方略，通达之士能够依据事态发展厘定规制。对于新时代的领导干部而言，无论是推动改革发展，还是抓好工作落实，都要算明白“时”与“势”这笔关键账，在“识时”上擦亮眼，在“随事”上见真章，才能在纷繁变局中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预“时”于未变，是顺势而为的前提。“因时”的第一步，就是能够预见“时”之将变，有先见之明。所谓“明者”，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能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捕捉到时代脉搏的细微跳动。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对“时”之变化的感知存在迟钝现象，有的把中央精神挂在嘴上，具体工作却还是老套路；有的看到新技术新模式，第一反应是“等一等、看一看”；有的明知基层实际已经变了，却抱着旧的条条框框不肯松手。究其根源，在于缺乏对大局大势之变的敏锐捕捉，把“求稳”变成了“拒变”。《孙子兵法》有言：“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意思是真正的善战者，往往在事情未发生之时就已布好局了。预“时”于未变，考验的是眼力，是在别人还没看到变化时就提前研判，在问题还在萌芽时就主动应对。这不是让人做“惊弓之鸟”，听风就是雨，而是要始终保持对客观现实的敬畏，看得见数据背后的趋势、现象背后的规律，时刻警惕自身认知上的滞后、方法上的固化，真正把研判做在决策之前，把预案做在风险之前。

识“时”于已变，是顺势而为的关键。如果说预“时”于未变考验的是眼力，那么识“时”而为考验的就是担当。看出变化不算难，难的是在变化真的来临之时，积极应对、果断出手。时变而法不变，犹如刻舟求剑。《盐铁论》里记载的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之士之间的辩论，表面上是政策之争，根子上是对“时”的判断不同。历史一再昭示，顺应时势，则事半功倍；逆势而动，则寸步难行。识时应变，就是要勇当时代的“弄潮儿”，明知调整伴有阵痛、改革存在阻力，也要在看清方向后毫不犹豫地迈出步子。历史不会眷顾因循守旧者，也不会等待畏缩不前的人。真正的“明者”，就是要敢于在旧经验的惯性里及时刹住车，善于在新形势的召唤下大力踩油门，做到识时识变、顺势顺导、善为善成。

随“事”于具体，是顺势而为的落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历史视角、战略思维，都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知者随事而制，重点在“事”。所谓“随事”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把研判落到具体的事情上。时代大势浩浩荡荡，干事成事终究要落到一件件具体事项之上。一项政策的调整，不能停留在文件里的“进一步”“持续”“深化”这类表述，而是要穿透纸面、直击实操，厘清哪类主体会受到影响，哪个环节需要优化调整，哪些领域发展预期会随之改变。领导干部面对纷繁变化的复杂局面，不仅要在具体矛盾上较真碰硬，还要在具体环节上抠细抓实。制“事”就要敢当“绣花人”，一针一线都落到实处，把新时势下的新要求，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考核的具体动作。尤为重要的是，要及时将应对变化的有效做法固化为制度，实现从“随事处置”到“成制立规”的跃升，让下一次变化来临时有章可循、有制可依。

制“事”于守正，是顺势而为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是坚守变化中不可动摇的根基，尊重客观事实，敬畏发展规律，坚守人民立场。变的是方法路径，不变的是前行方向；调的是施策尺度，锚定的是为民初心。一些地方，落实中央改革部署的初衷不可谓不好，却在刻意“求变”的冲动中渐行渐远，最终偏离了出发点，根源就在于缺少一个“正”字来压舱固本。守住这份“正”，才能在变化中不慌不乱、不偏不倚。守正绝不是守旧，而是守住明辨是非的标准、守住衡量得失的尺子。手握这把尺子，改革之“变”才有航向，探索之“新”才有根基。

“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因时而变，变的是方法，守的是方向；顺势而为，顺的是规律，为的是人民。只有把“时”看准、把“事”做实、把“正”守住，才能在变化中赢得主动、在浪潮中站稳脚跟，做到因时而变、顺势而为、行稳致远。

杂文撷英

十七间半里的文脉回响

——走进曹雪芹故居纪念馆

□ 高裕涵



秋天的风穿过广渠门内大街，闹市的喧嚣被一堵青砖灰瓦的院墙轻轻隔开。磁器口的东北角，一座清式三进四合院静立街角，门楣之上“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匾额古朴沉静。这里便是“蒜市口十七间半”，曹雪芹少年时随家族北归之后在北京的第一处居所。这里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有清代档案可据、有《乾隆京城全图》可证、有遗迹遗物可寻的曹雪芹故居遗址。跨越近300年时光，我们踏入院落，置身于故居屋舍之间，触摸一代文学巨匠的生命轨迹，体悟《红楼梦》所承载的文明精神与中华文脉。故居从来不只是建筑遗存，它是文学发生的现场，是时代沉浮的见证。

清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雍正帝下旨查封江宁织造曹家家产，曹家由此获罪抄家。依雍正帝圣旨，隋赫德为曹家保留了京师蒜市口的十七间半住房。昔日钟鸣鼎食的世家子弟，一朝跌落市井，从锦衣玉食的江南园林，转入京城南城的普通四合院。“蒜市口十七间半”对于曹氏家族来说，是他们昔日繁华绮梦的终章，也是曹家劫后余生的栖身之地。但对于曹雪芹来说，这里既是他踏向浮沉世间、直面人生百态、开启鲜活现实人生的新篇，也是他人生转折、思想蜕变、孕育文学巨著的起点。

蒜市口地处老北京南城，为南北商旅交汇、市井百态云集之地，人间烟火气绵延不绝。清朝时期，这里农副产品与日用百货交易频繁，商户铺面众多，酒楼戏馆林立，南来北往的客商、沿街叫卖的小贩、各色民间匠人与民间艺人、僧尼道士、三教九流的寻常百姓都汇集在这里。在来到此地之前，曹雪芹所见的是江宁织造府里精致繁缛的世家生活。居于十七间半的生活岁月，让他走出朱门高墙，直面真实的世间众生。贵族世家的盛衰记忆与南城鲜活的市井生活在此交汇碰撞，共同熔铸了曹雪芹的生命体验。或许正是蒜市口这段岁月，使他跳出世家子弟单一的视野，体察社会各阶层的悲欢苦乐，为日后《红楼梦》中包罗万象的社会图景埋下伏笔。书中精巧的器物、繁复的工艺、民俗风尚、人情世故，很多细节都根植于他这一时期在北京南城的所见与所闻。

步入纪念馆，木窗棂、青灰砖墙、院内草木复原了清代民居的素雅风貌。院落为三进四合院形制，格局规整，从前至后，一进院、二进院、三进院依次铺陈。一进院设置展厅1、展厅2，二进院分布展厅3、展厅4、展厅5，三进院配套艺坊。一进院为专属特展区域，不定期推出红楼主题文化展。三进院则作为公共文化空间，举办学术讲座、经典诵读、非遗体验。二进院为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常设展，分设“寻梦蒜市口”“红楼一梦”“归籍京师”三大主题篇章，以清代档案、古地图、考古勘探资料等史料还原历史情境。

二进院正房（展厅5）为“归籍京师”主题展厅。步入展厅，左侧展柜陈列着《曹寅奏谢钦点巡盐折（复制品）》等江宁织造曹家清宫档案复制品，用一手史料铺陈了曹氏家族由盛转衰的完整历程。同时，展厅一侧配有带音频的动画影像，还原曹氏家族江宁被抄后，曹雪芹与家人沿大运河由南京赴京、定居蒜市口十七间半的完整经历，诠释这段岁月为其创作《红楼梦》埋下深层伏笔。“故居缘起”部分，完整呈现了蒜市口故居自史料发现、原址发掘到院落复建的全过程：1982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张书才发现雍正七年（1729年）《刑部移会》，档案载有蒜市口“十七间半”的关键记载。展区陈列的《乾隆京城全图》中蒜市口院落位置清晰可辨，与档案文字相互印证。1999年旧城改造，蒜市口207号院拆除过程中发掘出的地基格局，恰与“十七间半”的记载吻合，经专家研讨论证，确认此地为曹雪芹故居。2019年，复建工程在原址东北侧动工，建成占地790平方米、建筑面积439平方米的清代制式三进四合院。同时，展区也展出了张书才的相关考证文章、考古勘探照片及文物资料等。

二进院西厢房（展厅3）为“寻梦蒜市口”主题展厅，把目光投向清代蒜市口的市井风貌。展厅复原旧时蒜市口一带街市商业景象，依次陈列老照片、民俗器物与传统手工艺品，并通过LED互动屏幕打造“熙攘世声”“未央夜乐”“书影清音”的沉浸式场景体验。蒜市口毗邻崇文门，是清代南北物资往来的要道，绢花、风筝、景泰蓝、绢人等京城民间工艺在此蓬勃发展。曹雪芹栖身于此，耳濡目染市井烟火，体察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二进院东厢房（展厅4）是“红楼一梦”主题展厅，围绕《红楼梦》版本源流与红学文脉展开。展区陈列《红楼梦》早期抄本、刻本影像资料，梳理这部经典在北京抄写、刻印与流传的历程。展厅同时展出后世红楼主题书画、戏曲等衍生艺术作品，既彰显出《红楼梦》跨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也展现出这部文学经典与绘画、曲艺等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

驻足院中，思接300年。从蒜市口的小院望向更广阔的文明长河，文学始终与家国、时代紧紧相连。伟大的作品，总是诞生于个体生命与时代风云的碰撞之中。曹雪芹亲历家族盛衰，见证世事变迁，以悲悯之心观照众生，用笔墨记录一个时代的社会百态，最终凝就《红楼梦》这部不朽之作。自《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而至明清小说，中华文脉绵延5000余载，经一代代创作者薪火相传。曹雪芹与《红楼梦》，正是这条文明长河之中一座巍峨耸立的峰峦。《红楼梦》凝聚诗词书画、建筑园林、医药膳食、礼仪民俗的精华，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大成。书中写家族、写儿女、写园林宴饮、写诗酒风雅、写世态浮沉、写人情冷暖、写命运无常，字里行间饱含对文明、世道与人性的深层思索。书中蕴藏的人文情怀、审美追求、价值反思，至今仍给当代人以启迪。这种对人的关怀，对美好事物的珍视，对世间悲欢的共情，对历史兴废的思考，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

夕阳斜照，院落青砖染上柔和的光影。走出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大门，门外依旧是车水马龙的都市。古今于此相逢，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蒜市口的十七间半，既是曹雪芹人生的转折之地，亦是不朽名著的思想起点。这座纪念馆，留存的不仅是曹雪芹的生活遗迹，更是中华民族深沉丰厚的文化基因。寻访故居，是一次回望，也是一场接续。在新时代，读懂红楼、传承文脉，汲取古典文学之中的人文智慧，坚定文化自信，让中华文脉在当代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故居新访